

“三农”问题： 政府行为合理化研究

朱剑峰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 阜阳师范学院学术著作出版专项经费资助
-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现代农业三维目标体系及实现路径探索》
(AHSK11—12D224)成果之一

“三农”问题：政府行为合理化研究

朱剑峰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农”问题:政府行为合理化研究/朱剑峰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4

ISBN 978-7-5650-2191-6

I. ①三… II. ①朱… III. ①政府行为—影响—农业经济—研究—中国
②政府行为—影响—农村经济—研究—中国 ③政府行为—影响—农民问题—
研究—中国 IV. ①F32②D42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78655 号

“三农”问题:政府行为合理化研究

朱剑峰 著

责任编辑 王 磊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邮 编	230009	开 本	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电 话	艺术编辑部:0551-62903120 市场营销部:0551-62903198	印 张	10
网 址	www.hfutpress.com.cn	字 数	155 千字
E-mail	hfutpress@163.com	印 刷	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2191-6

定价:38.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序 言

美国著名学者塞谬·P. 亨廷顿说，“中国的农村，不是稳定发展的基础，就是社会动荡的根源”；杜润生先生告诫“如果不解决‘三农’问题，必将影响国家社会发展和稳定”，“解决‘三农’问题涉及中国深层的政治经济体制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要指望毕其功于一役”。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从此拉开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从1982年至今，中共中央已发布十六个以农业、农村、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随着对解决“三农”问题认识的强化，政策支持力度也不断加大。中央在“三农”政策上由“支农”政策发展为“支农—惠农”政策，再发展为“支农—惠农—强农—富农”政策。通过全党上下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农业、农村和统筹城乡发展取得了重大进展，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形势大好，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

但是不能忽视的是，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而且城乡居民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上两极分化严重，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依然存在，城乡居民在基本权利和根本利益上的差别较大；农村市场发展滞后，农产品商品率低下，产供销体系没有健全，无法优化农村资源配置；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农村教育水平十分低下，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干群关系紧张，这些都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三农”问题的解决有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利于加快推进城镇化，有利于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最终有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政府注重解决“三农”问题有强烈的现实需要。2013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分

析“三农”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强调指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整个大局就有保障，各项工作都会比较主动；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始终把“三农”工作牢牢抓住，牢牢抓好；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基本问题，2014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推进农业现代化。

政府是“三农”问题解决的领导者、推动者，是农业、农村社会发展所需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是农业、农村社会全面发展过程的管理者。政府的职能要由“引导、支持、保护、调控”逐步调整为“管理、支持、保护、保障、调控”。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但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地方政府还不十分明确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应有哪些作为和如何作为，因此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

朱剑峰教授的新著《“三农”问题：政府行为合理化研究》即将出版发行，我由衷地感到高兴与期待，该著作紧扣时代脉搏，从政治学、经济学、行为学等多重角度，着重分析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党和各级政府在领导推动“三农”问题解决过程中作为的目标、条件、范围以及如何作为。该著作的问世既满足了理论研究的需要，又为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作为提供了理论研究和现实指导，是一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可读性较强的学术著作。

安徽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李光龙

2014年10月6日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001)
第一节 选题缘由和意义	(001)
第二节 研究思路方法及重要范畴界定	(004)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及评价和本书的创新点	(006)
第二章 我国“三农”问题的成因与政府的努力探索解决	(008)
第一节 “三农”问题形成和凸显的原因分析	(008)
第二节 我国政府在推动农村社会发展上的努力与成效	(017)
第三节 新形势下政府注重解决“三农”问题的背景透视	(028)
第三章 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角色定位与责任界定	(037)
第一节 “三农”问题解决中的政府角色与职能定位	(037)
第二节 政府在农业和农村社会发展中的责任界定	(046)
第三节 中央、地方政府在“三农”问题上的行为角色分析	(058)
第四章 中央政府在领导推动“三农”问题解决中的作为	(065)
第一节 有关农业和农村社会发展的制度构建	(065)
第二节 为农业农村社会发展提供公共产品	(072)
第三节 运用宏观管理调控权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	(078)

第五章 地方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作为	(086)
第一节 高层地方政府在“三农”问题上的作为	(087)
第二节 县乡基层地方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作为	(093)
第六章 解决“三农”问题的路径探索	(102)
第一节 农村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102)
第二节 大力加强优势农产品规模基地建设	
——阜阳市优势农产品规模基地建设的调查与分析	(118)
第三节 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对安徽省阜阳市农地非农化的调查与分析	(129)
附表	(142)
主要参考文献	(145)
后记	(153)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选题缘由和意义

一、选题缘由

“三农”问题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至今仍在激烈讨论的热点问题，多年来受到历届政府和国内外许多学者的格外关注。一批有关“三农”问题的学术成果相继问世，政府有关“三农”问题方面的政策也相继出台，农民利益日益受到重视，但“三农”问题还远未解决。正是在这样热烈的研究背景和形势鼓励下，作为一个出生在农村、与农民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对农民有着深厚感情的高校教师，我自觉有责任和义务加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行列中来，并尝试着运用行政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理论来探讨这一“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当然，由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系统性和强烈的政治敏感性，选取什么视角和具体特定对象，着实让我颇费思量。经过对已有文献资料的分类整理和比较分析，我认为“三农”问题的形成与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解决需要各级政府付出极大的努力。我最终确定从领导推动“三农”问题解决的主体的角度入手，将中央与地方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行为合理化定为我的研究课题。除了上述因素外，这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中国“三农”问题的形成与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对

于“三农”问题中的许多具体问题，我们可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动因、目标函数等方面理出线索，找出问题的症结；另一方面，政府是领导和推动“三农”问题解决的主体，政府在处理农业和农村工作方面所做的决策和行为，对农民增收和农村现代化的进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我国已于2001年加入WTO和市场经济体制已确立并逐渐完善的条件下，政府这一主体却未完成自身的转变。在解决“三农”问题这个世纪难题上，政府过去主要采用碰到问题“一事一议”“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不能很好地适应新的形势。因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但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地方政府还不十分明确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应有哪些作为和如何作为，因此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仍然十分必要和重要。这是促成我下决心研究这一课题的首要动因。

第二，通过整理分析文献材料，我发现由于传统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历史文化的影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上所处的位置和约束条件不同，致使它们在行为目标、行为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加上农民对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态度和情绪也大不相同，因而在分析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角色和作为时，不能过于笼统，要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加以区分，具体分析两个主体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角色特征和作用状况。只有这样才能找出县乡两级基层政府遭民怨的根源，才能对症下药地协调好中央与地方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关系。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于建嵘在湖南进行为期三年的调查后指出：“天下可忧在民穷，天下可畏在民怨。少数农民对基层干部施政行为的怨恨，发展到对体制的不满情绪，应该是一个十分清楚的政治信号。如果执政者不能清楚地理解这个信号，将产生的政治后果则是可以预测的。”^① 2013年12月23日至24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分析“三农”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强调指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农业基础稳固，农村

① 董月玲：《让农民自己说话》，《中国青年报》2003年7月9日。

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整个大局就有保障，各项工作都会比较主动。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始终把“三农”工作牢牢抓住，牢牢抓好。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因此，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角色与作为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具有学术研究价值，而且是时代赋予的迫切的政治任务。

第三，目前在“三农”问题上的研究还缺乏对政府的角色与作为进行系统深入分析和专门分析。到目前为止，关于“三农”问题政府角色与作为方面的研究有两大缺陷：一方面没有将政府明确区分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过于笼统，缺乏针对性，做出的结论主体模糊；另一方面对政府角色与作为的研究仅从属于如农业产业化、城镇化等某一具体出路的问题，所得出的结论零碎、散乱，没有系统化专门性的关于政府主体的研究。笔者尝试着运用行政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去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以期得到这方面全面系统的规律性结论，弥补目前在这方面研究的不足。这是我选定这一论题的愿望，我将为此做出积极的努力。

通过对“三农”问题上政府的角色与作为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我期望能弥补这方面研究的欠缺，同时为政府顺利解决“三农”问题献计献策。因而本选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二、选题的意义

“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是一个至今仍未被破解的真正意义上的难题，令历届政府忧心忡忡并为之不懈努力。

要破解这一难题，首要的是作为领导和推动这一难题解决的主体——各级政府务必明确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清楚自己在这一工作中的角色。但由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政府体制还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完善而实现由全能管制型向服务管理型转变。在“三

农”问题上，各级政府还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时至今日，我们仍期待以李克强为总理的新一届政府能在城镇化上有所作为。各级政府在“三农”问题上应该担当什么角色以及如何作为，这是在“三农”问题解决过程中首先必须完成的理论研究课题。本选题正是适应这一理论研究的需要，对中央和地方政府在“三农”问题上的角色与作为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以期弥补这方面研究的欠缺。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权责”，要“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十八届三中全会着重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本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此必须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本选题也正是响应这一精神，积极探索在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上中央政府、省市高层地方政府和县乡基层地方政府各自的角色、作为范围和作为方式，从而为各级政府努力解决“三农”问题提供理论支持。

总之，从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来看，本选题和立题研究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意义，而且对推动“三农”问题的解决也有较为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二节 研究思路方法及重要范畴界定

一、研究思路和方法

1. 研究思路：第一部分首先对选题研究现状进行评述，阐述选题的意义和明确研究的努力方向。第二部分接着对我国“三农”问题的形成、政府的努力和“三农”问题得到政府重视的背景进行研究分析，从而明确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中要承担首要责任。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第三部分对政府在“三农”问题中的角色进行定位，对其在农业、农村发展中的责任重新界

定,并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三农”问题上的行为角色进行对比分析,这一部分是文章立论的核心。第四、五部分是第三部分内容的扩展和自然延伸,分别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角度深入探讨它们各自在“三农”问题上的作为。第六部分是结合“三农”问题的主要方面,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路径。

2. 研究方法: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基础,遵循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理念来探讨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时的角色和作为。具体方法有:①逻辑与历史相统一;②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③抽样调查和例证;④抽象与具体相统一。

二、选题涉及的重要范畴界定及说明

在政治学文献中,政府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所谓广义的政府,是指一个国家内行使国家权力的全部国家机构,即包括全部立法、司法与行政机构。而所谓狭义的政府是专指一个国家的政权体系中的行政机构。由于“三农”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系统性的整体工程,虽然行政机构在其中起主导作用,但仍需立法支持和司法的合作。加上市场经济即法制经济,政府解决“三农”问题亦须依法进行。“三农”问题既是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基础问题,更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解决“三农”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中国梦”的严峻大考,是践行中国共产党使命的必然要求。因此,本文研究的主体不仅是广义的政府,还涉及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组织。

从层次结构上看,1982年《宪法》规定我国政府分为:中央、省(市)、县、乡四级,而目前现实存在则是中央、省、市(地)、县、乡五级架构的政府体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存在着明显的上下级关系,但地方政府作为相对独立的行为主体地位目前已得到基本确立。中央政府是有立法权、宏观管理权和宏观调控权的政府主体。省、市(地)政府有区域范围内的地方立法权、宏观管理权,属高层地方政府。县、乡两级基层地方政府,主要具有执行职能和组织当地经济发展的职能。因而在研究县乡两级基层政府在“三农”问题上的作为时,政府的含义偏向于狭义。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及评价和本书的创新点

一、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及评价

正如前文所述“三农”问题的解决是世纪难题，令历届政府忧心忡忡又为之努力奋斗，同时在这三十多年里，许多关注农民状况和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专家学者凭着自己的良知和历史责任感献身到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上来，研究成果数以万计，要对此作一概括与评价，我只能努力而为之。

通过研读大量的文献，我整理出以下几点：第一，对丰富具体的农业农村政策即对策性为主的研究偏多，且这些研究大多只涉及某一方面的政策措施，属局部研究。对农村税费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及土地流转、城乡一体化及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等方面研究是近十年来研究的热点。第二，关于“三农”问题的研究成果大多属经济学成果，而“三农”问题的产生有特殊的历史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且“三农”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的复杂、纵横的关系，这也是“三农”问题的解决成为世纪难题的原因所在，可以说“三农”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是多方力量博弈均衡的结果，因而有关“三农”问题的研究不能只表现在经济分析的层面上。第三，“三农”问题的深入研究必然涉及政治体制和对政府行为的评价问题，政治敏感性较强，致使学者们在深入研究“三农”问题时受到中国政治文化影响而难有根本意义上的突破。海外学者虽然受中国政治气氛的影响较小，能较客观、公正地进行研究，而且研究视角更广、更独特，但他们毕竟缺乏对中国农村状况的深入了解，也缺少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方面的知识信息，再加上远距离难以把握当今中国农村制度变迁复杂多样的实际形式，因而他们研究得出的一些结论或政策建议令人难以信服，只能偶作借鉴参考之用。

总之，海外学者的研究拓宽了“三农”问题的视野，启发了我研究“三农”问题的视角；国内学者的众多研究成果为我完成选题的研究提供了大量专题素材，但这些研究大都只涉及某方面政策措施，我自己以前关于“三农”

问题的研究成果也是如此，没有系统地从政府主体的角度、多方面多角度去研究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角色与作为，更没有把政府进一步区分为中央政府和省市高层地方政府以及县乡基层地方政府，从而更深入地研究它们在“三农”问题中的责任、角色与作为，而这正是本选题的视角与突破口。

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创新点

1. 中央政府、省市高层地方政府和县乡基层地方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上作为范围的划分。本文从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能力、职能和公共产品的层次性等多角度分析，划清了中央政府、省市高层地方政府和县乡基层地方政府在“三农”问题上各自的作为范围，并对政府在“三农”问题上作为的条件、目标进行了深入具体分析。

2. 县乡基层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角色与行为分析。县乡基层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既是中央、省市政府制定有关农村和农业政策的主要信息提供者，又是上级所制政策的落实者与执行者。县乡基层政府在“三农”问题的解决上处于上下关注的焦点位置，其行为直接关系到“三农”问题的解决。但在现实的经济政治生活中，一些县乡基层地方政府的施政行为（包括行为方式）引起了农民对政府和现行体制的不满，涉农问题的上访事件时有发生，因而解决“三农”问题关键在于明确基层地方政府行为的重点，规范其施政行为。对地方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角色与行为进行分析，是本书特色所在和重要创新之处，也是本论题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3. 本书对“三农”问题形成和凸显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分析。“三农”问题的形成与凸显有极其复杂的原因：既有传统价值观因素，也有历史原因和现实因素；既有政治上体制上的原因，也有农民主体自身的因素。

第二章 我国“三农”问题的成因与政府的努力探索解决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农业效益低、农村发展慢、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等问题日益凸显出来。“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现阶段表现为部分地区农业落后、农村闭塞、农民贫困。农村问题、农业问题、农民问题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互为一体,但“三农”问题的核心和集中表现是农民收入问题。2002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仍然是农民收入增长困难。”“增加农民收入不仅关系到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改善和农村社会稳定,而且关系到扩大内需方针的落实,关系到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2004 年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明确提出:“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难”。从 2004 年至 2014 年连续 11 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重点强调农民增收,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三农”问题已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的解决已成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2014 年 3 月 5 号,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强调指出: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推进农业现代化。

第一节 “三农”问题形成和凸显的原因分析

“三农”问题的形成与凸显,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既有传统价值观因素的影响,也有历史的、现实的原因和条件的制约;既有政治上的、体制上的

原因，也有主体因素的原因。

一、传统价值观念

泱泱中华，五千年灿烂辉煌的文明史，我们曾有过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农耕文明。它虽留给我们以世界古代史上最发达、最完善的农业耕作、灌溉体系和丰富的农业技术经验等值得自豪和继承的农业遗产，但与我国农耕文明相伴生的封建传统仍在延缓中国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的现代化，实质就是“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即实现农业产业化、农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民主化和法制化。^① 它必然要求农村主体树立现代化的价值观念，即市场观念、科学观念、开放观念、创新观念、民主观念和法制观念。但我国社会一直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以自给半自给经济为特征的农村社会。小农经济孕育出来的农本商末心态、求稳心态、安分守己的惰性心理、安贫乐道不求进取的人生态度等小农观念，使广大农民在市场取向改革过程中丧失了一次次良好的发展机遇，逐渐陷入相对贫困。还有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中的蒙昧观念、恋家情结、奴性观念、保守观念、宗法观念在广大农民内心深处根深蒂固，使得他们在走向现代化的征程中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而步履艰难。

二、历史的、现实的原因和条件

在市场取向改革中，我国农民由于不具备现代化的观念而丧失良好的发展机遇，这是“三农”问题形成的深层次的文化根源，但决不能因此而责怪勤劳而又忠厚的农民兄弟，这是历史文化积淀的结果。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三农”问题的形成与凸显还有复杂的历史的、现实的原因。

（一）历史根源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农民苦”的问题就被以梁漱溟先生为代表的人士提了出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分析“农民

^① 刘振伟：《为建设农村小康社会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农业经济问题》2003 年第 3 期，第 4 页。

苦”的问题时，指出“由于我国被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代理人压迫剥削了一百多年变成了一个很穷的国家，不但农民的生活水平低，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也都还低。”^① 中国近代社会一百多年，三大反动势力（帝国主义、国内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劫掠了大量农业剩余，加上 20 世纪上半期长达近四十年的战争，使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发展严重缺乏资金，因而我们完全可以说毛泽东称之为“三座大山”的三大反动势力对农业剩余及农业必要条件的掠夺，是“三农”问题形成的历史根源之一。

（二）国家工业化起步和加速发展的历史要求

1949 年 3 月，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② 同年 6 月 30 日，毛泽东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更加明确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工业化的问题”。他认为工业化的发展是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保障，是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法宝，而且又是将来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未来中国的现代化应该建立在大规模工业的基础上。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国内外环境，中国现代化进程进入第二阶段（1949—1978），为人民谋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选择了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

但新中国的工业化的经济基础是：人均收入水平 58 元，折合 15 美元，排名近于世界各国之末；积累率 5%，相当于低收入国家积累率的 1/3；以现代工业方式生产的产品还不到总产值的 10%；90% 以上的劳动力依赖传统技术，城市化水平仅 10%。^③ 在这样的基础上要筹集工业化所需的资本是摆在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大难题，解决的路径有四条：

（1）向当时世界主流社会即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国）请求援助。这要以丧失民族独立和牺牲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为代价。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381 页。

②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37 页。

③ 林善浪、张国：《中国农业发展问题报告》，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80 页。